

目 录

引 言

1

- 一、孤寂人生 1
- 二、诗性智慧 12

第一讲 《文心雕龙》的思想资源

24

- 一、文师周孔 25
- 二、道法自然 36
- 三、术兼佛玄 42

第二讲 《文心雕龙》的思维方式

51

- 一、弥纶群言 52
- 二、惟务折衷 58
- 三、沿波讨源 66

第三讲 《文心雕龙》的话语方式

72

- 一、玉润双流 73
- 二、宫商事义 83
- 三、比兴秀隐 90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讲 | 《文心雕龙》的文体理论 | 102 |
| | 一、文体分类 | 102 |
| | 二、文体形态 | 108 |
| | 三、文体风貌 | 117 |
| 第五讲 | 《文心雕龙》的创作理论 | 125 |
| | 一、神用象通 | 125 |
| | 二、情经辞纬 | 134 |
| | 三、心物赠答 | 143 |
| 第六讲 | 《文心雕龙》的接受理论 | 152 |
| | 一、知音之难 | 153 |
| | 二、知音之方 | 160 |
| | 三、知音之乐 | 168 |
| 第七讲 | 《文心雕龙》的作家理论 | 176 |
| | 一、才性异区 | 177 |
| | 二、率志委和 | 183 |
| | 三、傲岸泉石 | 187 |
| 第八讲 | 《文心雕龙》的文学史观 | 193 |
| | 一、兴废时序 | 193 |
| | 二、会通适变 | 201 |
| | 三、宜宏大体 | 205 |
| 结 语 | | 211 |
| | 一、千年文心 | 211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、世纪龙学 | 220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
附 录

230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治学感言：我是刘勰的学生 | 230 |
| 二、主要著作 | 232 |
| 三、主要论文 | 233 |
| 四、学术著作综览 | 237 |

后 记

242

引言

中国古代文学有两大显学，一个是红学，一个是龙学。我们知道：《红楼梦》讲“情”，《文心雕龙》讲“理”；红学研究曹雪芹，龙学研究刘勰。曹雪芹和刘勰，他俩有着相似的出身，人生也都比较凄凉，曹雪芹“举家食粥”，刘勰“家贫不娶”。然而，他们两位可能做梦都想不到：自己留下的著作，竟成了不少后人的饭碗和知本。在我们中国，还有国外，很多人都以研究《红楼梦》和《文心雕龙》谋生并以此为荣。有人做过统计，明清小说的研究论文中大概有40%都是研究《红楼梦》的。魏晋南北朝文论的研究论文中，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文章所占比例没有人统计过，我估计不会低于40%。红学和龙学既是显学，《红楼梦》和《文心雕龙》这两部书又是美文。《红楼梦》的美就不用我多说了，大家都较为熟悉。这个学期，我将和大家一起来研读《文心雕龙》这部美文，来探讨龙学这门显学。

今天，我们讲引言，重点向大家介绍刘勰的生平以及我所理解的《文心雕龙》主要的东方特色。

一、孤寂人生

先讲刘勰的生平，题目叫做“孤寂人生”。可以说，讲刘勰或《文心雕龙》这本书，还没有人用过这样的题目。我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呢？我有自己的理由。范文澜先生的《文心雕龙注》在《序志》篇的注释里面谈及刘勰生平的时候曾说到这么一句话：

所惜本传简略，文集亡逸，如此贤哲，竟不能确知其生卒，可慨也已。

就是说刘勰的传记非常简略，令人不由得感慨系之。周振甫所著《文心雕龙今译》一书在开头部分全文收录了《梁书·刘勰传》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：那么伟大的一位文论家，仅有400多字的传记，何等的单薄啊！而且，他本有的传行于世的文集在唐初就已经不幸逸失了。现在我们仅知道他的《文心雕龙》，和两篇有关佛教的论文，即《灭惑论》和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。

我们知道，中国的官本位意识十分严重，你的官做得越大，那对你的生平的记载就越发详细。比如皇帝，我给你们讲过唐明皇，他每天做什么，哪一天去华清池，哪一天去溱湖，史书皆有记载。可是刘勰做的官太小——县令，九品芝麻官一个，所以，能够在《梁书》中有400多字的传记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像这么伟大的圣贤之人，我们现在却不能确切地知道他的生平，而只能根据已有的材料进行推断，不能不让人深感遗憾和惋惜。

“孤寂人生”这个题目下面的三个标题，全部引自《梁书·刘勰传》的原文，我将它们梳理为刘勰一生中的三个重要时期。第一句话讲他的青年时代，刘勰从寒门少年变成高僧助手；第二句讲他的壮年，刘勰由文论家入世为官宦；第三句讲他的暮年，刘勰重返定林寺，削发为僧。

第一，家贫不婚娶，依沙门僧祐。

先讲他的青年时代。刘勰的青年时代有两件事情是很值得注意的，第一件是“家贫不婚娶”，第二件是“依沙门僧祐”。要弄明白这两件事，我们还得先解决三个基本问题。哪三个问题呢？第一，他生于何年卒于何年？第二，他的家庭出身如何？第三，他为什么不婚娶？而这三件事都是很有争议的，龙学界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。对每一个问题，我都择取了几种最主要、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分别介绍给大家。

先讲他的生卒年。关于刘勰的生卒年，有一个参照坐标，这个坐标就是《序志》篇里面他自己说的：

予生七龄，乃梦彩云若锦，则攀而采之。齿在逾立，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，随仲尼而南行；旦而寤，乃怡然而喜。大哉！圣人之难见哉，乃小子之垂梦欤！自生人以来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敷赞圣旨，莫若注经，而马郑诸儒，弘之已精，就有深解，未足立家。唯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。详其本源，莫非经典。而去圣久远，文体解散，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，饰羽尚画，文绣鞶帨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。盖《周书》论辞，贵乎体要；尼

父陈训,恶乎异端。辞训之异,宜体于要。于是搦笔和墨,乃始论文。

从上文可以看出,刘勰“齿在逾立”才“搦笔和墨,乃始论文”。我们知道,古人追求“三十而立”,“逾立”就是超过了三十岁。刘勰三十岁之后,因为梦见了孔丘,而后才撰写《文心雕龙》。这里的“逾立”就是我所说的坐标,以此坐标为参照系,我们就可以大致推断出刘勰的生卒年。然而,由于龙学各家对“齿在逾立”的具体理解以及对《文心雕龙》成书年代的具体考定不一样,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也就难免有差异。

关于刘勰的生年,有三种主要说法:范文澜认为刘勰约出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(465);我的导师杨明照先生推定的年份又稍微晚一点儿,他认为刘勰出生于宋明帝泰始六年(470);叶晨晖,也是一个大学者,他推定的年份更晚一些,认为刘勰出生于齐高帝建元二年(480)。

关于刘勰的卒年,也有三种主要说法:范文澜认为刘勰逝于梁武帝普通二年(521),依据是刘勰的师傅僧祐死于518年,僧祐死之后,刘勰又回到定林寺撰经花了两年时间,直到第三年(正好是521年)才去世;复旦大学李庆甲教授认为刘勰死于532年,即梁武帝中大通四年,他的根据是作为刘勰靠山的萧统即昭明太子死于531年,萧统死后,刘勰便受敕重回定林寺撰经,“未期而卒”,不到一年就死去了,所以刘勰应该卒于532年;杨明照先生推定的卒年要更晚些,他说刘勰死于梁武帝的大同四年,就是538年,杨先生的根据是宋代佛教经典《佛祖统纪》里有刘勰于大同四年出家的记载。我本人还是倾向于择取范文澜的观点,我认为他的说法比较合理而且能够自圆其说。那么,按照范文澜先生的推断,刘勰活了五十七八岁。

关于刘勰的家庭出身,龙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认为刘勰出身士族,另一种则认为刘勰出身庶族。主张出身士族的代表学者是王利器先生和马宏山先生,主张出身庶族的代表学者是王元化先生和周振甫先生。杨明照先生则对此不置可否,没有明确地表态。主张刘勰出身士族的,就是因为《梁书·刘勰传》开始有这么一段话:

刘勰字彦和,东莞莒人。祖灵真,宋司空秀之弟也。父尚,越骑校尉。

勰早孤,笃志好学。家贫不婚娶,依沙门僧祐,与之居处;积十余年,遂博通经论,因区别部类,录而序之。今定林寺经藏,勰所定也。

大家请看,刘勰的祖父刘灵真是宋代位居司空之高位的刘秀之的弟弟,而刘秀之又是刘穆之的侄子,非常有名望。这个刘穆之就更是不得了,他曾经参加过

宋高祖刘裕的开国大业,身为皇帝的得力助手,很受宠信。这还不说,据《宋书·刘穆之传》记载,刘穆之还是西汉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代哩。这个刘肥又是何许人呢?刘肥是刘邦的大儿子,只不过他是刘邦婚前跟情妇曹氏苟合所生,而非原配夫人吕后之子。所以,刘肥虽在刘邦诸子中排行第一却因为庶出而不能继承皇位。即便如此,刘肥毕竟还是很有势力的。这般说来,刘勰还是刘邦的后代,还有皇家血统呢!

但是,这个结论很不可靠。我们知道,《宋书》是沈约撰写的,后来,唐代的李延寿在编《南史》的时候就把《宋书·刘穆之传》“汉齐悼惠王肥后也”一句给删掉了。后人对此予以考证,可能前面的《宋书》只是个推测,并不切合史实,因为中国的古人在有势力、有名望之后总是习惯于附皇族、攀高枝儿。譬如,我们所熟知的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,他那点皇族血统就很可疑。而且,据王元化先生考定,刘穆之和刘秀之都不是什么贵族门第,而是出身平民,靠打仗起家。王先生还参照《文心雕龙》所显现出的思想观点来对刘勰的家世加以印证。我们都知道,《文心雕龙》强烈地反对讹滥之风,《程器》篇在许多场合都对当时士庶等级森严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批评,表达了刘勰的满腔义愤,《序志》篇也自称“耿介于《程器》”,而这种态度是正符合于一个贫寒庶族的身份的。

概括起来说,主张刘勰出身庶族的理由主要有两点。第一点,就算刘穆之和刘秀之是刘勰的祖宗,但他们两人其实也都不是士族出身。还有,刘勰的祖父做过什么官,没有历史记载。刘勰的父亲刘尚只做了个越骑校尉,官位不高,而且在刘勰的孩提时代就过世了。这样,刘勰早早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孤儿,母亲也不幸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撒手人寰。后来他竟潦倒到了“家贫不婚娶,依沙门僧祐”的地步,穷得不仅娶不上媳妇,而且要到寺庙里面去投靠僧祐才能维持生计。这便是证明刘勰出身庶族的一个非常确凿的证据。但在马宏山先生看来,刘勰原是“东莞莒人”,其近祖又“世居京口”,父亲刘尚也官至越骑校尉,所以,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兼官僚,是“过江”的门阀士族。只不过刘勰在青少年时期因“早孤”、“家贫”而成为一个没落士族的后代罢了。主张刘勰是贫寒庶族的第二点理由跟他的婚娶相关,关于这点我待会儿还要讲到。

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,《梁书·刘勰传》里面说他是东莞莒人,这个东莞在今天的山东省日照市,而不是现在广东省的那个东莞。这个莒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莒县,春秋时曾有莒子国在此建立,到东晋的时候莒县就已经不属于晋国的地盘了。我们知道西晋后期发生了“永嘉之乱”,西晋王朝也随之走向覆灭。西晋东迁的时候,原来在北方的贵族纷纷跑到南方来,建立了东晋政权,并在江南侨置了一些郡县。比方说,在山东有东莞郡,那么到南方之后东晋明帝又设了一个东莞郡,叫做南东莞。这个南东莞就在京口,即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。其实,刘勰的祖籍

是山东莒县，到刘勰的祖父刘灵真这一辈就已经搬到京口住了，所以他实际上出生在镇江。而如今，北方的莒县、南方的镇江两个地方都建有刘勰纪念馆，都竞相举办龙学研讨会。

接下来，我们看第三个问题，刘勰为什么不婚娶？关于这个问题有四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认为虽然刘勰出身士族，但是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业已衰落，破败不堪，这一点跟我们熟知的曹雪芹很像。据马宏山先生推测，刘勰之所以“不婚娶”是因为其出身士族，而当时的社会厉行“士庶不通婚”，他不可能和庶族女子成亲。同时，他的“早孤”因而“家贫”，也导致不会有士族大姓愿意将他纳入联姻的考察对象。所以，他就只好单身不娶了。

第二种说法认为刘勰出身庶族，因为身份低微又家境贫寒，人家闺女都看不上他，他也娶养不起。王元化先生从刘勰的生平事迹出发为此找到了一些线索。首先，刘勰撰成《文心雕龙》之后想见沈约却“无由自达”，非得装作卖东西的干谒于沈约的车前。关于这个，我后面还要详细讲述。刘勰连拜见沈约的机会都没有，可见“士庶天隔”的等级界限是多么分明，又可见刘勰的社会地位是多么卑下！其次，尽管后来的刘勰因《文心雕龙》而受到沈约的赏识，在入仕后又为昭明太子所爱接，但沈约和昭明太子的史传和文集竟然没有一句话称道刘勰，也没有记载一件涉及刘勰的事情，可见他仍旧“未被时流所称”，这很可能与其寒微的出身紧密相关。由此，王先生认为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都是因为他出身贫寒庶族。

第三种说法是杨明照先生的，很有意思。他认为刘勰之“不婚娶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家境的艰难，跟出身士庶也没有关系，而是由于刘勰信佛。杨先生在他的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一书中指出：

然则舍人之不婚娶者，必别有故，一言以蔽之，曰信佛。

这种分析也是颇有些道理的。杨先生说刘勰年轻的时候固然穷苦，但是他一进入梁代就开始做官了。虽然此时已年过四十，但还是可以娶媳妇的呀，高既不成，低亦可就吧！那他为什么不婚娶呢？这恐怕就与刘勰的信佛不无关系了。另外，我们也要看到，僧祐与刘勰朝夕相处多年，他对刘勰的影响也是存在的，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更为直接。僧祐这个人挺具传奇色彩，据《梁高僧传》所载，僧祐从小即有向佛之心，几岁大的时候曾经随父母到建初寺礼拜，因踊跃乐道，竟然不肯还家。他的父母出于无奈就允许他入道，于是僧祐便留在了建初寺，拜僧范为师，遍学经律。更为有趣的是，僧祐十四岁之时，家人秘密地为他访婚，不想他闻到风声立马就逃，最后跑到钟山定林寺投了法达法师。僧祐和刘勰，一个逃婚，一个终

身未娶，两者之间有无关联颇值得我们思索和玩味。

第四种说法的持有者是范文澜先生。那么范文澜是怎样看待刘勰不结婚的原因的呢？用一个字来概括，那就是“孝”！我们讲过，刘勰的父亲早逝，母亲也在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去世了。按照古时的礼俗，刘勰需要丁忧（守孝）三年，三年过后就二十三岁了。正值此时，定林寺的著名佛学大师僧祐开始传法讲佛，招募弟子。刘勰便在母亲的孝期结束后进了定林寺去投靠僧祐，成了高僧的得力助手。刘勰在定林寺里面一待就是十多年，既然在定林寺里面，那当然就不能结婚啦。等他从定林寺出来的时候，已经三十多岁。之后，因夜梦孔丘，他决定写作《文心雕龙》，并因此又耗费了四年的时间。待到三十七八岁，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倒是写就了，但他却把最佳择偶时间错过了，这叫做事业第一，婚姻第二。总之，刘勰没有结婚，打了一辈子的光棍，这也是我说他人生很孤寂的一个重要缘由。

对于像刘勰这样贫寒却又好学的青年，当时最好的去处是哪儿呢？毫无疑问应该是寺庙！南朝的寺庙对于当时的刘勰至少可以解决三大问题：一是温饱问题，二是读书问题，三是就业问题。刘勰到定林寺依投僧祐，可以避租课避徭役，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，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定林寺有相当多的藏书可供刘勰借阅，有很多学问满腹的高僧和同门可资请教与切磋。此外，南朝从皇帝到王公大臣，从文士到武将，信佛者众多，达官贵人、鸿儒俊彦经常出入寺庙，著名的寺庙譬如定林寺简直就是一个高级沙龙。出身寒门又胸怀大志的刘勰当然希望能在定林寺结识达官显贵，为自己日后的仕途做好铺垫，打下基础。

第二，干之于车前，状若货鬻者。

接下来，我们讲刘勰的“负书候车”。在中国文学史上“负书候车”是个很有名的典故，讲的就是刘勰。我们知道，刘勰曾给南朝著名的佛学大师僧祐做助手达十年之久。那么，他主要协助僧祐做些什么事呢？整理佛典、编排目录、撰写序跋、处理往来书信等都是他少不了的工作内容。由此，刘勰广泛涉猎了众多佛教典籍，具备了较为高深的佛学造诣，现今还有他所撰写的两篇佛学论文流存于世间。尽管如此，刘勰的理想却并不在佛教上，他情有独钟的是儒家，对孔圣人充满了无限的崇拜之情。因为夜里梦见孔子，刘勰激动万分，他想到文章与儒家经典的关系，又审视了当时的文风习染，萌发了著《文心雕龙》的强烈念头并即刻着手撰写，其间之艰辛劳苦自不待言，前期的准备和厚积更是不可或缺。杨明照先生曾这样描绘刘勰在定林寺刻苦习文的生活：

舍人依居僧祐后，必“纵意渔猎”，为后来“弥纶群言”之巨著“积学储宝”。于继续攻读经史群籍外，研阅释典，谅亦焚膏继晷，不遗余力。

这样,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,刘勰终于完成了五万四千多字的《文心雕龙》。按照我们现在的速度,三四年可以写四五本书,一本书往往几十万字。我们看看,刘勰这五万多字却辛辛苦苦地写了四年,真可谓呕心沥血,所以,《文心雕龙》成了人类文化史上一部不朽的精品。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《“数字化”管理与“文字过客”》(《教育双周刊》2006年2月版)里不无感慨地说道:“一篇书信体的《报任安书》或《与元九书》不知胜过多少篇核心或权威期刊的论文,一部骈体文的《文心雕龙》或随感式的《沧浪诗话》又不知胜过多少部国家级或省部级出版社的巨著!”

关于《文心雕龙》成书的时间,清代学者刘毓崧的《书〈文心雕龙〉后》一文认为它完成于“南齐之末”。刘氏考证的依据是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篇里的一段话:

暨皇齐驭宝,运集休明;太祖以圣武膺箒,世祖以睿文纂业,文帝以贰离含章,高宗以上哲兴运,并文明自天,缉熙景祚。今圣历方兴,文思光被,海岳降神,才英秀发,驭飞龙于天衢,驾骐驎于万里。经典礼章,跨周轹汉,唐、虞之文,其鼎盛乎!鸿风懿采,短笔敢陈;颺言赞时,请寄明哲!

请大家注意,刘勰在“齐”字前面加了个“皇”字,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字,它里面还大有文章呢。纵观《时序》篇所述,自唐虞至刘宋的历朝历代,刘勰都只是列举朝代名,而他讲到齐代时却特别称之为“皇齐”;并且,《时序》篇对魏晋的皇帝都只称谥号而不称庙号,齐代四帝除文帝因身后追尊,只称为帝,其余都是称祖称宗的;还有,《时序》篇对历代文章都是有褒有贬,唯独对齐代的君臣父子竭力颂美而无规过之词;我们再把视野放得开阔些,《文心雕龙》的《明诗》、《通变》、《才略》等篇章所论述的朝代都止于南朝的宋代,齐代文人均未有涉及。根据以上的分析,我们可以推定《文心雕龙》应当完成于南朝齐代末年。至于它完成的具体年代和时间,刘毓崧说:

东昏上高宗之庙号,系永泰元年八月事,据高宗兴运之语,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后。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,系中兴二年四月事,据“皇齐驭宝”之语,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。其间首尾相距,将及四载。

刘氏的考证科学而合理,他的这条论断也较为可信。齐明帝永泰元年是498年,齐和帝中兴二年是502年,所以说,《文心雕龙》完成于498年至502年之间。

那么,我们今人眼里十分伟大的《文心雕龙》在它问世之初的境遇又是怎样的呢?据《梁书·刘勰传》记载:

初，勰撰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，论古今文体，引而次之。其序曰：“夫文心者，言为文之用心也。……”既成，未为时流所称。勰自重其文，欲取定于沈约。约时贵盛，无由自达，乃负其书，候约出，干之于车前，状若货鬻者。约便命取读，大重之，谓为深得文理，常陈诸几案。

刘勰写就《文心雕龙》之后，并没有被当时的名流看重和称道，他仍然是个无名之辈，泯然于大众之中。大家知道，西晋曾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大文学家叫做左思，出身寒门，诗写得很棒，就是湮没无闻，不为人知。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窘境，左思就去请当时的权贵和名流皇甫谧为自己历时十载创作的《三都赋》作了篇序。美文加上名人推介，使得《三都赋》即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，一时间“豪贵之家竞相传写，洛阳为之纸贵”，左思也就借助于皇甫谧而一举成名，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颗新星。刘勰对这一文坛掌故自然烂熟。大概受到了“洛阳纸贵”的启发，为了谋取一定的功名和地位，刘勰决定用《文心雕龙》作为敲门砖来求得当时炙手可热的重量级人物沈约的赏识和提拔。

沈约何许人也？历仕南朝的宋齐梁三代，在齐末的时候官至梁台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兼右仆射，政治地位十分显赫。而且，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沈约还是一代文宗，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，著名的“永明声律说”就是从他起始的。我国古典诗歌从古体到近体也就是从六朝的五言诗到唐代的律诗，这一巨大转变和演进如若没有沈约的“声律说”就根本不可能实现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通篇采用骈散结合、以骈为主的写法，骈文本身就讲求声律。此外，刘勰还辟有《声律》篇专门对声律予以探讨，和沈约多有共同语言。综合看来，沈约极有可能成为《文心雕龙》的知音并因此推重刘勰。

可是，当时的沈约位高权重，不是一般人想见就能见到的呀，更何况刘勰还是一介寒士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拜会沈约。常言道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刘勰毕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有自己的“撒手锏”。刘勰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将《文心雕龙》的书稿装在一个布袋子里面，自己就背着这个袋子，守候在沈府的大门口。沈约出来后，刘勰便不失时机地拦车求见，向其推荐自己的著作，整个看着就像一个书商贩子搞推销似的。好在沈约不愧为一代名流，胸襟开阔，他欣然接受了刘勰的献书，回到家还认真看了一遍《文心雕龙》。沈约读后颇有感触，可以说是“如亲化雨，如坐春风”吧，对身为该书作者的刘勰更是顿生相见恨晚之感。从此以后，《文心雕龙》因为“深得文理”成了沈约案头的常备书，刘勰也因受到沈约的器重而声名鹊起，他的人生开始出现转机。梁王朝一建立，刘勰就步入仕途。让我们一起来翻阅一下刘勰的任职简历。《梁书·刘勰传》有云：

天监初，起家奉朝请。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，迁车骑仓曹参军。出为太末令，政有清绩。除仁威南康王记室，兼东宫通事舍人。时七庙飨荐，已用蔬果，而二郊农社，犹有牺牲；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。诏付尚书议，依勰所陈。迁步兵校尉，兼舍人如故。昭明太子好文学，深爱接之。

“天监”是梁武帝萧衍的年号，天监元年就是502年，也就在这一年刘勰担任“奉朝请”一职，开始了他的宦宦生涯。这个“奉朝请”是个什么官呢？《宋书·百官志下》解释说，“奉朝请”就是“奉朝会请召而已”，可见，这只是个没有实权的近于虚衔的小官职。但对刘勰来说，谋得这一官半职就已经备尝艰辛，很不容易了。天监三年（504），刘勰兼任了梁武帝萧衍之弟、时任中军将军的临川静惠王萧宏的记室。记室就相当于秘书，是个清要之职。天监八年（509），刘勰喜获升迁，被任命为车骑仓曹参军，负责掌管临川王府的车骑仓库，官职还较低。约在天监九年（510），刘勰又升为太末令。太末就是浙江的衢县，是个出了名的贫困县，白居易的一句诗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”，说的就是这个地方。史书夸赞刘勰“政有清绩”，具体有哪些业绩，于今已不得而知了。可见，刘勰是个通才，不仅文章写得好，而且富有政治才能，官也当得不错，并非那种“练治而寡文”或“工文而疏治”（《文心雕龙·议对》）的偏材之士。约在天监十一年（512），刘勰出任梁武帝的第四子、仁威将军、南康简王萧绩的记室，同时兼任昭明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，主要掌管文书的进呈工作。通事舍人的职位还是比较重要的，梁朝对此十分重视，常选拔一些有才能的人来充任。其实，刘勰最有面子的官儿就是这个职务，世人也以刘舍人相称。

按理说，刘勰与昭明太子相处六七年之久，两人自然有不少接触，关系应该挺密切的呀。可是，萧统所有的文集里面根本就没提到刘勰，除去上文的“深爱接之”，史书更无其他记载。这又是为什么？《梁书·昭明太子传》谈到萧统与文人学士的关系时，这样称赞他：

引纳才学之士，赏爱无倦。恒自讨论篇籍，或与学士商榷古今，闲则继以文章著述，率以为常。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，名才并集。文学之盛，晋宋以来，未之有也。

从中可知，昭明太子酷爱文学、广交天下文人，他身边的才子多得难计其数，刘勰只不过是萧统结识的众多文人中的一位罢了，他仅能享受萧统博爱中的一小份而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刘勰被昭明太子疏忽也很正常嘛！从刘勰方面讲，在昭明太

子身边工作并与他切磋学问是攀了一个高枝儿,但刘勰并没有因为萧统“深爱接之”就升官晋爵,更可见刘萧两位的关系其实较为一般。

后来,刘勰又升过一次官,却跟他的政绩没有关系,而是跟佛教相关。当时,皇帝七个祖庙的祭祀供品都改用蔬菜和瓜果了,而二郊(祭天地)、农社(祭社稷,即谷神和土地神),还在用牺牲。刘勰就向梁武帝上了一份奏表,建议祭天地和祭社稷同祭七庙一样都只用蔬果做供品,不要再用牺牲了。奏表得到了梁武帝的高度重视,他立马命令尚书省对其进行论证,并最终采纳了刘勰的建议,将之颁行全国。因为上书有功,刘勰一下子被提拔为步兵校尉,负责掌管皇家林苑的警卫军,同时依然兼任东宫通事舍人。

为什么说刘勰这次升迁与佛教有关呢?这要从梁武帝笃信佛教谈起。在中国历史上,有位被人们称作“菩萨皇帝”的君王,他就是梁武帝。梁武帝信佛信得很厉害,以至于到了很迷狂、很夸张的地步,他曾四次舍身为佛,最后还以身殉佛,史书称之为“佞佛”。我的《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》一书对梁武帝信佛的故事有专门的讲述,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我们知道,佛教是戒杀生的,刘勰建议所有的祭祀都不用宰杀的牛羊做“牺牲”,也是出于佛家的慈悲情怀,信佛甚深的梁武帝自然乐于听闻和采纳。

第三,燔鬢发自誓,末期而卒。

最后讲一下刘勰的暮年。天监十七年(518)五月,刘勰的恩师僧祐在建初寺去世,享年七十四岁,僧祐的弟子正度为他立碑颂德,刘勰则因为善为文章、“长于佛理”而接下了撰制碑文的重任。我们看《梁书·刘勰传》:

然勰为文长于佛理,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。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。证功毕,遂启求出家,先燔鬢发以自誓。敕许之,乃于寺变服,改名慧地。末期而卒。文集行于世。

“敕”就是皇帝的诏令;佛教以编撰经藏为功德,故将其称为“证功”;这里的“期”读做“jī”,一期就是满一年,末期就是不到一年。僧祐去世以后,皇帝下令说,僧祐的事还没做完,你刘勰是他的助手,就回到定林寺和慧震和尚一块编撰佛经吧。这样,刘勰再次来到定林寺,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去整理佛经。事成之后,刘勰主动地请求皇帝允许他出家,而且,在皇帝还没批准的时候,他自己就先烧去鬢发,发誓出家。后来,皇帝同意了。于是,刘勰便在定林寺变服为僧,改名叫做慧地,皈依佛门不到一年就辞别人世了。青年时代的刘勰在定林寺住了十多年都没有剃度出家;而这次编完佛经之后,回过头来,还可以继续当官的呀,他还没有到

退休年龄哩。那么,暮年的刘勰为什么不到两年就削发受戒,自誓成佛了呢?我想,大概有三个原因。

第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,刘勰年轻时候的儒家梦到这里已经破碎了。你看《文心雕龙》的《程器》篇和《才略》篇,刘勰是很自负的,他认为大丈夫既要能文也要能武,既要有做官的才能,也要有写文章的才能。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讲到。刘勰实际上就既有文才也有宦才,可是二十来年的宦宦生涯已经向他昭示了这个仕途是多么的艰难。刘勰还算是幸运的,有沈约的推荐,而且还跟萧宏、萧绩、萧统等皇室有着较为亲近的关系,可就是这样也没有做上多大的官儿。最后,仅仅因为一份改变供品的上书才升了几级。他的儒家之梦、仕宦之梦已经破灭。

第二个原因,刘勰其实有着道家思想,《序志》篇的“赞曰”云:

生也有涯,无涯惟智。逐物实难,凭性良易。
傲岸泉石,咀嚼文义。文果载心,余心有寄。

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家思想,我们以后还要专门讲刘勰的这个思想资源。刘勰对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、庄子,对魏晋玄学的干将比如说阮籍、嵇康,还有王弼、何晏等都是推崇备至的,这亦可见刘勰对道家思想的追求和向往。我们知道,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是儒道互补的,他们一旦对儒家失望,就去投奔道家。儒家一退场,道家立马登场。那么对刘勰来讲,退出儒家之后,他的一个最好的去处当然就是隐遁出世,清静无为。

第三个原因在于刘勰本人对佛家是很有研究的。虽然他给僧祐当助手时,并没有变服为僧,但他毕竟在浓厚的佛教的环境里长大,深受佛教的浸染和影响。常言说得好: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”刘勰是懂佛教的,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佛学家,寺庙里面要制什么碑文都要请他来写。而且,他也写过很多佛教论文,可惜保存下来的只有两篇,相关内容在前面已有提及。所以,在他对儒家失望、对道家向往的时候,佛教就自然地成了他最好的归宿。这一点对刘勰来说是很有悲剧意味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刘勰的理想是要兼济天下,立德立功立言,是要干一番事业。他是为了干一番事业,为了出来做官才写《文心雕龙》的。他好不容易用《文心雕龙》这块砖敲开南朝仕宦的大门,可是进去之后,等待他的又是漫长而艰辛的低级官吏的仕途,所谓“煎熬于微吏”。最后,他又重新回到了年少时去过但没有把心放进去的佛门,以一个佛教徒的身份告别了人世。在离开人世的时候,他不是刘勰,而是慧地。这是一个具有悲剧意味的身份转换。更具悲剧意味的是,《文心雕龙》的写作对于刘勰来讲只是一个工具,一块敲门砖,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写论文著书是为了评职称拿奖金一样。刘勰本人并不看重著书立说,他看重

的是当官。然而,最后使他永垂不朽的,既不是他的那个小小的太未令,或者通事舍人,也不是这个慧地的法号,而是《文心雕龙》。

总的说来,刘勰的一生都是很孤独很寂寞的。我有一个观点,刘勰是生活在三个世界里的。哪三个世界呢?文的世界、儒的世界和佛的世界。^①年轻的刘勰在寒冷的定林寺里面,暮鼓晨钟,青灯古卷,笔耕不辍,辛辛苦苦了三四年写成的《文心雕龙》却很久不被世人看重,孤寂得很,这是他的文的世界;后来,好不容易因为《文心雕龙》写得好,受到沈约器重而出来做官,在仕途上前前后后奋斗了二十来年,虽“政有清绩”,却怀才不遇,难于跻身高位,儒的世界里他依旧孤寂;在佛的世界里面就更加孤寂了,刘勰始于沙门,终于沙门,晚年削发为僧,皈依佛教,最后于定林寺孤寂地死去。所以,我把刘勰的生平概括为“孤寂人生”。

二、诗性智慧

上一周讲了刘勰的“孤寂人生”,这一周讲刘勰的“诗性智慧”。

何为“诗性”?日常话语中的“诗性”,泛指文学性、艺术性、审美性;学理层面的“诗性”则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术语,特指原始人类所共有的思维特征,就是万物有灵,万物同情,万物同形,用钱钟书的话说就是“以无生者作有生看,以非人作人看”^②。这两个层面的“诗性”其实有着内在的关联。维柯《新科学》指出,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,原始人都是一些诗人。他们相信:山有脚,川有泪,大海会哭,太阳会笑……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,而单个的人,即使是生活在文明的理性的时代,他(她)在自己的童年时期也是有诗性的,也就是维柯所说的广义上的诗人。

我们说刘勰有“诗性智慧”,在上面所讲的两个意义上都是可以成立的。上周我们讲过刘勰的两个梦,多么有诗意!尤其是第一个梦,也就是他七岁时做的那个梦,充满了童年的诗情和画意。后来年轻的刘勰选择用骈体文写《文心雕龙》,更是一位文学理论家的诗性选择。

但是,我今天给大学生讲刘勰的“诗性智慧”,不是在日常话语的层面而是在文化人类学的层面。就《文心雕龙》而言,前一个层面的诗性,在龙学界已经成为共识,用不着我多费口舌;而后一个层面的诗性,至今无人谈及,可以说是我自己的学术新见。

^① 参见拙著《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讲演录》第七讲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年。

^② 钱钟书:《管锥编》(第四册),1357页,北京:中华书局1986年。

我为什么要在引言中讨论刘勰的“诗性智慧”呢？因为这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在这个全球化时代，在这个西方文论话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，我们如何认识、如何评价《文心雕龙》的价值和地位？

大家都知道，鲁迅先生有一段很著名的话：

篇章既富，评鹭遂生。东则有刘彦和之《文心》，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《诗学》，解析神质，包举洪纤，开源发流，为世楷模。

亚里士多德堪称西方文论之父，他的《诗学》是西方文论的奠基之作。鲁迅拿东方的刘勰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作比较，当然是对刘勰的推崇和褒扬。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：在何种层面上刘勰与亚里士多德可以相提并论？《文心雕龙》体大而虑周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诸多典籍之中，向来以系统性和逻辑性著称；而《诗学》同样是体大而虑周，整个西方文论，其理论形态的逻辑化和哲学化就是以《诗学》为起点的。从时间上讲，《诗学》在前，《文心》在后，《文心》是因为理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才获得与《诗学》相媲美的资格的。因此，以《诗学》为楷模来褒奖《文心》，实际上是强调西方文论标准，强调《文心雕龙》与这一标准的契合。我认为，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典范，《文心雕龙》有其自身的质的规定性：诗性与逻辑性的统一。长期以来，海内外的龙学研究，常常过于推崇逻辑性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她所特有的诗性智慧，从而遮蔽了《文心雕龙》的东方特色，遮蔽了以《文心雕龙》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民族特性。听到这里，大家一定明白了我要在引言中讲述刘勰诗性智慧的良苦用心。

第一，谁其尸之，神理而已。

标题中的这个“尸”字，看起来很恐怖，其实它与“尸体”无关，在古汉语中是“主宰”、“统驭”的意思。这句话出自《文心雕龙》的《原道》篇：

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极，幽赞神明，《易》象惟先。庖牺画其始，仲尼翼其终。而《乾》、《坤》两位，独制《文言》。言之文也，天地之心哉！若乃《河图》孕乎八卦，《洛书》搢乎九畴，玉版金镂之实，丹文绿牒之华，谁其尸之？亦神理而已。

刘勰以“自然之道”作文学本体之论，这在龙学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在刘勰看来，天、地、人三才，各以自己的“文”有声有色、亦妙亦奇地显现着自然之道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刘勰的“原道”并没有就此止步，他在由天地山川动物植物之文引出“人之文”之后，继续追问“人文之元”，追问人文之元的肇端——太极。

何为“太极”？从宇宙起源的意义上讲，“太极”就是指混沌初开、天地始行之时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说：“是故易有太极，始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也讲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《周易》说的“太极”也就是《道德经》说的“道”，她是“天地之始”，她是“万物之母”，她依照自身的规律而外显为文，于是就有了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篇用诗性话语所描绘的“日月叠璧”、“山川焕绮”、“云霞雕色”、“草木贲华”、“林籁结响”、“泉石激韵”、龙凤之“藻绘”、虎豹之“炳蔚”……这些都是天地之文，都是自然万物之文。

那么，“太极”或者说“道”又是如何外显为“人之文”的呢？或者说，“人之文”即“人文”是以何种方式来显现自然之道的呢？我刚才所谈到的刘勰《原道》篇的那段文字，里面所提及的“八卦”代表《周易》，“九畴”代表《尚书》。我们知道，《周易》和《尚书》已经是文明时代的精神产品，是人类有了文字之后的人文创造。《原道》篇将人文的创造表述为“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”，而从“心生”到“言立”，从“言立”到“文明”这样一个逻辑过程，放在人类文化史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。在文字尚未出现的史前文化时期，在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“诗性智慧”时代，我们人类凭借什么来创造“人之文”？凭借什么来显示自然之道？维柯《新科学》说，凭借“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”；而刘勰《原道》篇所提到的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作为史前时代的“人之文”，无疑是想象力的产物，是诗性智慧的结晶。

我这里有两段关于《河图》和《洛书》的视频，大家先看一看。（放映视频）

大家看了视频，知道所谓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其实是史前文化的两个传说或者说是神话。“河图”，就是黄河里面的龙马，背上有一幅图；“洛书”，就是洛河里面的神龟，背上驮着一摞书。河图和洛书的上面，画的都是一些黑白相间的圆，像围棋棋子一样。这些黑色的和白色的圆，奇偶相间地排列在东西南北中等不同的方位。于是，这里面至少有三重象征意味：第一，黑和白各象征什么？第二，奇数和偶数各象征什么？第三，不同的方位又象征什么？关于这些疑问，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，学术界还在探索和争论之中。

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的传说，最早见于《尚书》。孔安国给《尚书》作传，说“伏羲氏王天下，龙马出河，遂则其文，以画八卦，谓之河图”；又说“天与禹洛出书，神龟负文而出，列于背，有数至于九，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，所以次序。”可见，伏羲是依据《河图》画出了八卦，也就是完成了《易经》创作的第一个阶段；而大禹是依据《洛书》制定了九类常道，也就是《尚书·洪范》中说的“洪范九畴”。所以，《周易·系辞上》说：“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。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也就是说，伏羲氏和大禹这两位大圣人，分别以《河图》和《洛书》为准则和依据，来从事并完成他们的人文创造的。

当然，上面所谈到的孔安国的两段话，均可以当作神话或传说来解读。孔安